

从绝望到反抗:权力视角下 托妮·莫里森小说中孩子形象探析

曹玉洁^{1,2}

(1. 陇东学院 外国语学院, 甘肃 庆阳 745000;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 广州 510420)

摘要:托妮·莫里森作品中,孩子形象可以分为不断发展变化的三种类型:最初的以佩科拉为代表的逆来顺受型孩子,发展为以秀拉为代表的反抗失败型孩子,最终演变为以布莱德为代表的自我重生型孩子。莫里森透过孩子的眼睛显现黑人真实生活状态,突出权力机制运行下种族歧视的不合理性和非人道性;同时,通过黑人孩子形象的逐渐发展,象征黑人民族的成长、反抗与希望。

关键词:孩子形象;权力话语;全景敞视主义;托妮·莫里森小说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21)03-0092-05

托妮·莫里森笔下的孩子几乎都受到白人种族歧视和黑人内部歧视,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大多成为野孩子、社会的弃儿、无助的孤儿,或者心理上严重异化的孩子。莫里森作品中,众多孩子形象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以《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为代表的逆来顺受型,以《秀拉》中同名主人公秀拉为代表的反抗失败型,以及以《上帝会救助那孩子》中黑人女孩布莱德为代表的自我重生型,众多孩子形象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权力无处不在,权力关系处于流动的循环过程中,每个人都处于权力网中,每个人既能是被权力支配的对象,也可能成为权力的实施者。在权力机制运行中,全景敞视主义最能体现规训性权力通过监视、检查对人进行支配和控制。本文以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秀拉》以及《上帝会救助那孩子》为考察点,从权力话语、权力的性论述以及全景敞视主义三方面分析莫里森小说中的孩子形象。

一、以佩科拉为代表的逆来顺受型孩子

福柯认为权力始终与话语紧密联系,任何话语都

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当话语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权力,这便是话语权。在其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描写了以佩科拉为代表的最没有社会地位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黑人小女孩。小说中的佩科拉很少发声,她在自己的故事中保持沉默,她的故事交予更加独立的黑人女孩克劳迪娅进行叙述。莫里森放弃逆来顺受的佩科拉,选择独立的克劳迪娅陈述故事,是为了突出言语主体佩科拉的失声与权力息息相关。佩科拉社会地位低下,将自己交与他人,由他人界定自己的人生,“失去了话语权,更多的时候是失去辨别、判断能力的‘听者’,最终导致她成为‘盲从者’”^[1],过着逆来顺受的生活。

话语的目的除了交流与沟通,其最大的功能在于建构,黑人女孩丧失话语权,也意味着她们丧失了自我建构的能力。“话语建构了我们生活世界,建构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是话语建构了我们主体自身”^[2]。由于黑人民族缺乏话语权,无法为自己发声,黑人孩童在形成世界观的关键时期,接触的世界皆是白人话语中呈现的面貌,他们将白人真理视为生存准则。像佩科拉这样的黑人女孩认为,正是自己异于白人的体貌特征导致家庭、学校和社会的

收稿日期:2021-02-24

基金项目:陇东学院 2018 年度青年科技创新项目“从绝望到反抗——托妮·莫里森小说中孩子意象探析”(项目编号:XYSK1806)

作者简介:曹玉洁(1989—),女,甘肃庆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教育与英美文学。

嫌弃和厌恶,她否定自我,单纯地认为只要自己拥有一双像白人那样蔚蓝的眼睛,一切都会改变。佩克拉童年时期象征着被贩卖到美洲大陆、遭受奴役的黑人民族的早期时代,初期黑人奴隶不能随意交谈或读书写字,从口头至书面完全被剥夺了话语权。由于长期被奴役,黑人在白人社会中未能拥有平等话语权,沦为社会的盲从者,缺乏自我建构的力量。因此,佩科拉在小说中的失声,受到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和黑人社区的伤害,代表着黑人民族话语权的缺失,是黑人民族无法构建自我、认同自我的伤悲。

佩科拉疯癫的悲剧是权力话语对黑人民族不断否定、排斥的结果。权力话语能够制造纪律和标准,话语机制生产真理和理性,理性“要么对非理性实施绝对排斥,要么对它进行温和的改造”^[3],通过不断否定,非理性被视为疯癫。疯癫与理性本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理性将自己构建成文明,将疯癫定义为败坏,使得疯癫永远丧失话语权。以白人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人为赋予白色以美的寓意,将黑色视为丑陋,剥夺黑人民族的话语权,建立权力话语下的理性审美,引导大众追逐白人理性审美。黑人女孩长期浸泡于白人理性审美,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肤色美,否定黑人审美和生存价值,等待她们的是悲惨的人生结局。黑人女孩对白人审美、理性审美的渴望,是对权力的追求,但正是对权力话语下理性的追求导致了她的疯癫。

二、以秀拉为代表的反抗失败型孩子形象

莫里森的小说《秀拉》描写了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黑人女孩秀拉。她的行为在黑人社区掀起轩然大波:她寡廉鲜耻随意性交、拒绝听从祖母结婚生子的要求、拒绝抚养祖母。秀拉的行为不符合社会准则,但“‘恶名远扬’的秀拉其实有很强的主体意识,深藏在‘恶’之下的是她自我意识的觉醒。正是这种‘恶’消解了传统模式的黑人女性形象,颠覆了‘男权统治’,解构了黑人社区底层的种种法规,唤醒了黑人社区向‘善’的群体意识,激发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4]与佩克拉相似,秀拉受到白人社会的歧视和压迫,也受到了黑人社区的伤害和控制,母亲亲口说不爱她(秀拉),家庭中父亲角色缺失,秀拉失去家庭的温暖和受到黑人社区的敌视和仇恨。与佩克拉不同的是,秀拉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孩子形象,她挑战权威,漠视权力话语下的传统知识体系,她的反抗体现在对性交恣意的态度、对传统婚姻的拒绝以及与权力化身

的祖母决裂。

福柯在论述性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任何权力运作都离不开对身体的控制和宰制”^[5],“性则是权力网络渗透到个人身体和人类整体生命之中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有关性的知识和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可以进一步有效地对生命本身进行权力的运作。”^{[5]247} 权力话语所建构的性爱准则具有唯一性并发生在异性之间。秀拉不让男人们留宿,与镇上任何男性欢愉,与奈儿产生同性之恋,她恣意的性交颠覆了传统的两性关系,是对传统性规范的挑战,更是对拥有自主权力的争取。“通过发明新的性经验,权力也拓展了自己的统治空间”^[6]。性交中秀拉不满足于扮演传统女性角色,她掌握主动权,将男人压在身下感受自我,只有在床上,她才能感受到真实的自我。于秀拉而言,每次性交都是一次权力争斗的胜利,为秀拉拓展了更大的权力空间,是抵御权力范式、实现掌握权力的象征。

秀拉忤逆祖母夏娃,拒绝结婚生子,这是她更决绝地反抗权力关系中传统范式。权力关系所指的性也包含婚姻、生育等广义的性。人的肉体是权力最早的规训对象,性便成了社会、国家控制人类的工具和手段。男性文化对女性身体进行长期的规训,导致黑人女性一味遵从权力规训,依附男人和家庭,忽视自我需求和个体认同。祖母夏娃依照传统范式,要求秀拉结婚生子,整个社区也以此为规范,无论婚后生活幸福与否,黑人女性循规蹈矩,步入婚姻,将一生奉献于家庭,努力创造看似完美的生活,失去了自我。其实,祖母夏娃等所谓的完美生活是以权力话语规范准则为依据,并非真实的完美,无法为黑人女性带来幸福。由此可见,秀拉对权力机制第二维度抵抗,表现在她拒绝结婚生子,反对权力话语对黑人女性角色的定位,拒绝成为失去自我的“贤妻良母”。

秀拉对权力话语下传统性机制的第三维度反抗体现在她对祖母的遗弃。现代权力又被称为生命权力,最高权力的典型特权之一就是生杀大权^{[6]100}。祖母夏娃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权威,象征着黑人社区最高权力。她救活儿子李子,也在黑暗中放火烧死儿子,决定全部家庭成员的生命,是权力的化身。秀拉对祖母的反抗,本质是对至高无上权力的挑战。祖母独自撑起整个家,无疑是独立的,但“由于长期的压迫和歧视,女性对自我的建构完全取决于她所依附的白人

主流文化和男权社会,她们的自我已经泯灭”^{[4]81}。秀拉对祖母命令的反抗,是对夏娃所代表的权力、所维护的男权社会权威的蔑视,她将祖母赶出房子送入养老院是与权力的彻底决裂。

秀拉萌生自我意识,开始反抗之路,但她未能认识到权力争斗的目的不是拒绝一切权力规训,因为权力已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权力争斗错误的理解导致她最后反抗失败。福柯主张权力不存在对与错、好与坏、管理与被管理的二元对立结构。秀拉将权力划分为非错即对的两极,抛弃祖母、与黑人社区隔绝、敌对,与权力机制划清界限,抛弃黑人文化根基,赶走祖母成为房子的主人,扩张自己的权力空间,这一行为的实质并非是为权力斗争,而是进行了权力的转换。权力依然存在,秀拉只是将祖母拥有的权力夺入自己的手中,推翻了过去机制,为自己制定了新的权力中心。秀拉的失败在于她不懂得反抗权力的实质。福柯所定义的革命和反抗的实质是改善人们的生存状况,尤其是被压抑的人群。秀拉一生都在追寻自我,反抗传统权势,她成长于黑人社区,但最终未能获得家人的热爱、社区的理解和社会的接纳,其自身生存状况并未得到切实改善,也没能团结黑人民族,给受压抑的黑人社区带来新的生机,从这个意义而言,秀拉的反抗是失败的。

三、以布莱德为代表的自我重生型孩子形象

孩子形象在莫里森笔下不断地发展,除了塑造权力规训中逆来顺受者和反抗失败者,莫里森也描写了反抗成功的孩子形象。《最蓝的眼睛》中,权力话语造成了以佩科拉为代表的黑人憎恨自己的民族特征,崇拜白人主流文化而丧失自我的悲剧;《秀拉》中秀拉对权力的盲目反抗导致了敢于反抗的先锋者丧失了民族身份和民族精神,抛弃家庭与社区,最终反抗失败;在《上帝会救助那孩子》中,莫里森歌颂为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奋斗的黑人女孩,她们通过不断的自我救赎及民族救助,最终获得新生。

黑人不但忍受白人和种族内部的双重歧视,更遭受家庭亲人的多重歧视,种族内部和家庭亲人对肤色深浅的歧视是全景敞视主义运作的结果。“全景敞视主义的对个体不断‘探找、检查和分类’的强大功能不但将黑人和白人不同族群区分开来,而且即便是在黑人内部,这种权力挤压也造成个人区分。在黑人社区内部,肤色的深浅成为区分各自的地位和等级的标

记。”^[7]《上帝会救助那孩子》中,黑人女孩布莱德的出生为整个家庭带来了不幸。她肤色深黑,父亲在她出生后抛弃了家庭,母亲嫌弃她的肤色,认为她的深肤色使得家庭原本拥有浅肤色带来的优势丧失,布莱德不但遭到白人压迫,更受到父母的嫌弃。莫里森在开篇写道母亲甜蜜看到女儿布莱德的反应:“这不是我的错。不怪我,我什么都没做错,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意识到出问题了,很大的问题。她黑得吓到了我。午夜般黑”^[8]。女儿出生后,母亲感到震惊和羞耻,她甚至“把毛毯捂在她的脸上用力压”^{[8]5},企图杀死自己的孩子。黑人母亲对女儿黑肤色的羞愧源于全景敞视主义对个人的区分,白人至上文化的长期渗透使得黑人自觉遵守白人规训,维持种族主义社会秩序的运转。

规训权力机制对空间进行了严格的分割,“每个人都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9]。将白人与黑人从空间上分类,对黑人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和控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保护自我获得基本生存权,黑人自动与白人隔离,黑人种族内部不断进行自我规训,进一步强化种族歧视的影响。母亲对女儿的伤害是为了保护女儿,为了教会女儿如何在“最后一个被雇佣,第一个被解雇”^{[8]41}的世界生存。母亲自述,“我不是一个糟糕的母亲,你要知道这点,我也许伤害过我唯一的孩子,可我是为了保护她,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浅肤色享有特权。”^{[8]3}受种族歧视影响,母亲用最残酷方式教女儿在种族社会、权力规训下的生存法则。由此可见,制约黑人的不仅是白人监督者,更是全景敞视主义下无形、无处不在的权力,权力的运行维持了种族社会秩序,造成了黑人民族痛苦。同时促使黑人民族内部出现如布莱德父母此类维护白人制度的被规训者,通过黑人主动地自我压制,强化了白人权力规训,从而达到自我保护、保护家人的目的。

现代主体是权力机制建构的结果,黑人女性主体构成是白人权力机制与父权制共同运作的产物。布莱德遭到父亲的离弃、母亲的冷漠、白人男子的欺辱、男友的离开等,这些伤害对她造成了严重的身心创伤,促使她失去自我主体意识,产生自我怀疑。男友离开后,她的身体出现异常,原本丰满的胸部变得扁

平,生理期推迟,阴毛与腋毛逐渐消失,母亲带她打的耳洞不复存在,所有征兆表明布莱德逐步变回孩子。莫里森“采用魔幻现实的写作手法,书写了布莱德面对创伤时不知所措,以幻觉或其他侵入方式不断复现而又无法控制的反应”^[10]。身体上的变化象征布莱德精神和心理上的退化。“亲情创伤所产生的疏离感和排斥感使受害者倍感陌生、冷漠、孤立无援、被抛弃”^[11],原本事业有成、风光无限的女强人重新变回童年时无助孤独、不知所措的黑人女孩。这一现象表明在权力机制与父权制的运作下,布莱德成年女性主体建构失败。

莫里森作品中的孩子形象不断发展体现在黑人女孩从最初的自我否定到最后的自我治愈、自我建构的心路历程。在以布莱德为代表的黑人女性自我重建历程中,充分展示全景敞视下权力双向运作的特点。童年时为了得到母亲的关注,布莱德诬陷白人女教师索菲亚,她出庭指证索菲亚,得到母亲的赞许。全景敞视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处于监督且被监督的境地,既拥有权力也被权力制约,种族主义社会中,白人也受到权力的制约。白人女教师享有白人特权,但她不仅是权力的监督者,也是被监督者。女教师被指控变童,指证者正是黑人女孩露娜安^①。法庭上的白人处于被凝视的位置,而黑人女孩的指证使黑人难得地处于优势位置,白人与黑人在法庭上位置互换,充分体现了全景敞视主义社会下的权力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相互的。黑人女孩在法庭指证白人的行为,不论真伪、道德与否,首先是对白人权力的一种反抗行为。

布莱德的自我重建表现在她并不是一味否定自我、逃避现实。白人女教师出狱后,布莱德向女教师表明身份后遭到痛打,这一举动对于她是黑暗中的救

赎,让她直面并改正过去的错误。向女教师道歉、寻找男友布克的路途,是受伤者布莱德通过疗伤进行自我治愈、自我寻找和自我建构的历程,最终在找到男友并与他解除隔阂后,布莱德曾经消失的成人特征又回来了。莫里森使用魔幻现实主义元素描写布莱德从大人变回孩子,再回归大人的过程,这是布莱德重新塑造全新自我的过程,小说最后她和男友孕育的孩子更是新生活、新希望的象征^{[8]175}。布莱德的治愈过程,不但得益于黑人姨母的照顾,也受到了白人夫妇的救助。莫里森在小说中超越了种族界限,鼓励黑人民族冲破种族歧视的藩篱,超越封闭和自我封闭的生存状态,依靠社区力量,团结各个种族,解构白人至上的社会规训,获得个人成长及民族自强。

四、结论

莫里森声称要为“被边缘化了的女孩”发声。黑人群体在白人社会处于边缘地位,黑人妇女在黑人社会亦处于边缘,黑人孩子尤其是女童位于更加边缘的边缘。莫里森关注被完全边缘化的黑人孩童,透过儿童的眼睛揭开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暴力,显现黑人真实生活,突出权力机制运行下种族歧视的不合理性和非人道性,借助黑人孩子的悲惨畸形遭遇,对黑人民族所受的苦难表示同情,对造成这种苦难的权力话语下的种族歧视进行谴责。她笔下的儿童形象不但指黑人儿童及其成长历程,也是整个黑民族成长的象征,从最初塑造的逆来顺受、最后疯癫的佩科拉,到积极反抗却失败的秀拉,再到布莱德的重生和孕育希望,孩子形象的逐渐发展,象征着黑民族的反抗与希望。白人与黑人的相互帮助、相互理解标志着社会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受创伤的不幸孩子终将得到救赎,黑民族终会获得成长,社会各个民族最终会相互团结,相互包容。

参考文献:

- [1] 陈长利. 论福柯的三维话语理论[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 128.
- [2] 周宪. 福柯话语理论批判[J]. 文艺理论研究, 2013(1): 124.
- [3] 施敏. 疯癫: 理性囚禁下的沉默客体: 读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C]// 全国生命伦理学学术会议, 2007: 243.
- [4] 李喜芬. 艰辛的“自我建构”之旅: 对莫里森小说《秀拉》的女性主义解读[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5): 80.

① 露娜安: 即布莱德幼年时期的名字。

- [5] 高宣扬. 福柯的生存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26.
- [6] 索良柱. 福柯:从权力的囚徒到生存美学的解救[D]. 上海:复旦大学,2009:96.
- [7] 李霞. 以福柯的规训理论解读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J]. 外语研究,2013(2):108.
- [8] TONY M. God Help the Child[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2015:3.
- [9] 迈克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21.
- [10] 刀喊英. 莫里森《家》中创伤书写的权力维度[J]. 外语研究,2019(4):103.
- [11] 庞好农. 创伤与异化:社会伦理学视阈下的《上帝会救助那孩子》[J]. 北京社会科学,2017(6):7.

From Desperation to Defense: Analysis of Child Image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 from Power Perspective

CAO Yujie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ongdong University, Qingyang Gansu 745000, China;
2. Center for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In Toni Morrison's works, the child imag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hat are constantly evolving: the first obedient and submissive child represented by Pecora develops into a rebellious and defeated child represented by Sula, and finally evolves into the image of Bride who has realized self-rebirth. Morrison shows the real life state of the black through the eyes of children, highlighting the irrationality and inhumanity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under the operation of the power mechanism.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the image of black children, it symbolizes the growth, resistance and hope of the black nation.

Keywords: child image; power and discourse; panopticism; Toni Morrison's novels

[责任编辑 夏强]

(上接第 86 页)

The Dilemma of Media Transformation Under Commercial Aesthetics:

An Exploration of the Literary Film Adaptation of the Movie *The Great Gatsb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media Narrative

LIN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403,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film adaptation is the focus of cross-media narrative research. Taking the movie *The Great Gatsby* (2013 edi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emantic change incurr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adaptation, in particular, the narrative distance, narrative space and the characterization, and focuses on the "super-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uitive and flowing images. In addition, the paper studi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anti-narrative factors in the ideographic structure of film art, so as to reveal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age presentation space and the inner story space, and then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and outlets faced by literary film adaptation under the logic of commercial aesthetics.

Keywords: cross-media narrative; film adaptation; emergent effect; super-discourse; commercial aesthetics

[责任编辑 夏强]